

疫情中的隔洋对话

人物：

- 小明：某京大学学生；疫情爆发时在纽约交换；
- 小李：某华大学学生，小明的好友；疫情爆发时在武汉家中。

时间：2020年3月中旬；

疫情情况：武汉仍然处于封锁状态之中，不过疫情基本上得到控制；纽约有零星的感染病例，尚未进入指数扩散期。

小明：听说武汉这两天新增病例不多了，你们差不多要解封了吧？

小李：是啊，黑暗就要过去了。看到说纽约这两天也有几十例新冠了，有点像我们这边两个月前的情况啊，很可能过几天情况就很严重了啊，你有考虑提前回来吗？

小明：的确是这样，估计到月底纽约就会有上万人感染了。不过我倒是没打算现在回来，留在这边最多就是自己感染一次病毒，按照现在的统计数据来看，就算感染了，我们这个年龄段死亡率也可以忽略不计，这倒没啥可怕的。现在国内封锁政策这么严，回来多半是要被一直关在家里，这我可受不了。我还是留在这边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吧。

小李：嗨，你现在不觉得害怕，只是因为你们这边疫情还没扩散起来吧。

小明：我是真的觉得这个疫情没什么好怕的，大概率就是一场小感冒而已。国内当时那么恐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开始还没有研究清楚这个病毒的能耐，再加上各种以讹传讹，所以才闹得人心惶惶的吧。

小李：的确有这个因素，不过就算是现在，知道得比当时更清楚了，也没有谣言的干扰了，我还是觉得这个病毒很可怕啊。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如果感染了，扔三个骰子，如果前两个都是六点，那么就是重症，需要上呼吸机的那种，如果第三个骰子还是六点，那么人就没了。我觉得这真还是挺可怕的。

小明：好吧，看来对于同样的数字，我们的感受不太一样。这我能理解，不过国内政府那么粗暴地就把所有人都关在家里不准出门，这我是真的无法理解。

小李：我觉得这很合理啊。一个多月前，我们这里每天还是上千例的新增感染，封城这么一段时间下来，这疫情就控制得差不多了嘛。你看这两天每天就只有几十例新增了，再过一阵子应该就能彻底清零了吧。要是没有强制把大家关在家里，真不敢想象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

小明：封城这个措施的确是降低了感染的人数，这点我也同意。但是这一定是一件好事吗？

小李：为什么这么问？少感染一些人，就少死一些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嘛。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小明：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这只是一句政治口号嘛。要是真的高于一切，每年流感也要死好几千人呢，怎么不一有流感就封城？交通事故也要死那么多人，怎么不干脆就不准人们开车了呢？就偏偏这个新冠疫情要封城？

小李：那如果这个病毒毒性比现实中的要强，就比如说像埃博拉病毒那样，感染上了就有百分之九十的概率会死的很惨，而且传播力还是像现在这么强呢？那你会不会还是像现在这样宁愿呼吸带病毒的自由的空气呢？

小明：嗯……那我估计也会被吓得不轻吧。那样的话我觉得封城也挺有必要的。

小李：这样一说，我觉得问题就清楚了。遇到死亡率千分之一的流感，显然不应该封城，遇到死亡率百分之九十的空气传播版埃博拉，显然应该封城。那在这两个数值中间肯定可以画一条线，死亡率超过多少，就应该封城。还可以把传染性也考虑进来，就变成在二维平面上画一条曲线，处在曲线以上，就应该封城，否则不应该。这就是一个技术问题了，找一群专家来算一下，把这条曲线给算出来，政府按照这个做决策就行了嘛。

小明：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没办法搞出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判定死亡率多高才是太高、传染速度多快才是太快，毕竟这还是一个主观判断。我们两个人就这个问题分歧都这么大，更不要说全社会那么多人了。恐怕很难达成一致的。

小李：这个问题也简单嘛，投票解决就好了啊。搞个专家委员会，出几份研究报告，然后投票表决一下，如果不通过，那就再研究嘛。

小明：那照这样说，国内的封城决定可是没有投票就做出了的。

小李：毕竟这是紧急情况嘛。如果要走这一套程序的话，花费的时间估计要不少，那时候疫情早就扩散得不可收拾了。

小明：这样的话，政府是不是就可以以紧急情况为理由，想干什么都行？

小李：当然还需要有一个事后追责的机制。你看湖北的省委书记和武汉的市委书记，不就很快被免职了嘛。当然，他们被免职是因为做的太少，不过如果哪一个地方官员做得太过火，肯定也会受到相应的追责。

小明：你说的这个是政府体制内的追责。而且这些官员被免职，是因为做得太少，如果他们做得过多，反而不会有什么后果。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这套官僚体制还是很有效的，上级想要干什么，只要把这个指标和下级的晋升挂钩，下级就会拼了命的去迎合这个目标，同时把这个指标摊派给下级机关。就这样层层加码下来，每一层都很有干劲，事情也就做成了。在这个过程中，做的不够用劲，达不成上级摊派下来的指标，就会受到惩罚，晋升受阻，甚至像你提到的那样，直接被免职。但是反过来，如果他们用力过猛，尽管可能在其他方面有一些不好的结果，但只要完成了上级摊派的那一个指标，他就是安全的。而一旦这些官员用力过猛，公民的权利就很容易受到侵害，我觉得，搞什么封城，完全就是这种用力过猛。

小李：这次封锁武汉的决定应该不能说是这样层层加码，用力过猛的结果吧，这个决定应该是直接出自于最高层的决策。我听说当时很多地方的领导反而是反对封城的呢。

小明：这也不影响我上面说的这个逻辑嘛。虽然整体封城的决定是最高层下达的，但是具体到每个街道、每个社区、每个小区怎么处理，那还是这样的层层加码的过程。前几天不是有新闻说，某村委会干部搞防疫政策，听说有一户凑了几个人打麻将，就带了一群人冲进去掀桌子打人；或许市里面只是说了不能搞大规模聚集，然后县里说十人以上聚会都不行，一层层到了村里就成了这样。即使上级的初衷是好的，这个机制也会带来各种副作用。

小李：但是你看这样的事情被发现之后，上级就会意识到原来的目标还会有别的维度的影响，那么就可以对之前下达的目标进行更正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嘛，比如说之前地方官员的考核唯GDP论，但是后来发现这样对于环境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于是就提出了新的口号，并且把环保成绩也计入官员考核中，于是这两年来这个问题就好了很多啊。

小明：你举的环保这个例子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在最高层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口号之前，下面的各层政府基本上就是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的，而他们也都知道大建工厂这种发展经济的方式会造成污染，很多地方饱受雾霾之苦也还是要继续搞这些高污染产业；不是他们不想治理环境，而是压在他们身上的考核目标容不得他们去治理环境。只有等到最高层发了话，这种考核标准才会改，下面的人才能去解决早就想解决的问题。这种体制干一件事情效率的确是高，但是要转向就只有等到最高层发声了，才能有所动作。而在即将进行转向的时期，有的官员没有判断好政治风向，还是按照原来的标准行事，一旦转向，这些人可能就会被杀鸡儆猴；这次湖北被免职的两个大领导，也可以看作是因此下台的。

小李：为什么说他们是这样下台的？他们下台不是因为向上级隐瞒疫情还有反应缓慢吗？

小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是他们为什么当初要这么做呢？还不是因为没有正确判断上级在这种情况下，会将考核重心放在疫情的控制上，之前的主要考核目标此时就退居其次了。他们当时一定是认为，如果大力搞防疫，经济指标就会很难看，于是他们的考核也会很难看，这才没有积极响应。如果他们当时知道考核的主要标准会变成对于疫情的控制程度，那他们当然会不遗余力地搞防疫，甚至不等上级决策，自己就把武汉封城了。只是他们不幸判断错了上级的风向而已。

小李：我觉得不能这样说。他们不是没有判断对风向，而是思想上出了问题。用官方一点的话来说，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应该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应该是只考虑自己晋升的投机主义分子；不论是本来就不在意人民的利益也好，还是把握错了风向，都是说明他们思想上出了问题，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是好的人民公仆，就该被剔除出去。

小明：那么所谓的合格的共产党员、好的人民公仆，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一套标准？

小李：应该是有的吧。虽然我自己没有认真读过，但是什么马原、毛概这些课的教科书上有大段大段的相关论述，体制内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文件，从这些东西里面应该能得出相应的答案的。

小明：拿马原、毛概的教科书来说，我记得我们现在用的这本就是这两年出的新版本，和之前的区别还蛮大的。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动呢？还不是因为最高层的风向有了变化。

小李：我觉得不应该这样理解。用马原书上的话说，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只有不断运动的相对真理。人们对于真理的认知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教科书的更新、官员考核标准的变

化，就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局部看来，变化的方向可能是有些随意的，但是总体看来却是有明确的方向的，是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前进的。

小明：什么叫做更好的呢？是谁觉得更好呢？

小李：我觉得是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就像柏拉图说的理想世界。有那么一个绝对的善，之只是我们没法直接把握。我们所能做的，是不断地逼近它，不断地改善已有的对善的认知。政府所代表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善的最先进的认知，它的作用就是宣扬现有的认知，并且不断地改进这个认知；我觉得这就正是我们的这个政府在做的。过程中肯定会有曲折，但是这是真理，或者说善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不同的人可能对于什么是更好的有不同的认知，只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绝对的善的认知处于不同的阶段，这是有高下之分的。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要推行善，因此好的政府的行事方式应该是从贤，而不是从众。

小明：你的意思是，政府就代表了现有的最接近于绝对的善的认知，和政府的观点不一样，就代表你的认知是落后的？这是不是有点盲目了？

小李：乍一看是会有这个感觉。但是政府有各种机制来确保它能够吸取政府外对于善的先进认知，同时政府内部也有很多的机构在不断地进行研究。这就可以确保政府能够至少是非常接近前沿的，能够确保它推行的政策不会有大的错误。

小明：对于该吸收什么，不该吸收什么，还不是领导说了算。看起来政府是在不断吸收新的意见，但是其实还不是领导想要吸收什么就吸收什么，反正政府内那么多笔杆子总是能把领导想要吸收的包装得冠冕堂皇，铺天盖地的宣传机构也能让大家都相信这个东西。归根结底，这个体制就是最高层的独裁而已。

小李：我觉得不能把我国的政府看做这样一个独裁政府。虽然说自上而下的官僚层级决定了最高层的影响力很大，但这并不代表最高层可以为所欲为。政府归根结底还是要对人民负责的，而且现在搞的其实是集体决策制，也并不是哪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如果政府偏离了真正的善，而是想要通过宣传机构蒙骗大众，是迟早会露馅的，而且政府内部也能够纠正这种企图的。

小明：这里说的都很理想啊，那么现实中我国政府内部相关的制度安排是怎么样的呢？

小李：这个我确实不太了解，我觉得要讨论这个问题还需要做更深入的专门研究。

小明：这个我也不了解，而且我想也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这一套制度安排和决策机制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就是问题所在。政府做事情是很不透明的，而且似乎它也并不想让人搞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做事的。虽然政府每年都会出台浩如烟海的文件，但是这些东西越多，就越难搞懂它背后的机制。虽然说学界有不少的研究尝试揭开政府决策的神秘面纱，但是目前还有很多东西都搞不清楚。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问题。

小李：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说了这么多，的确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对于政府面纱之下的庐山真面目的猜想。如果能够弄清楚这一套决策机制，那么我们的讨论会有效很多。不过，我还是相信，我们的政府的最终目的是推行善，而不是一个精心包装的独裁政府。

小明：那我们再回到什么是善这个问题。假设说存在一个绝对的善的标准，世界上对于这个标准也有很多互相抵触的阐释。这就好像是各个宗教之间一样，每个宗教的信徒都认为自己

的信仰是绝对正确的，各个宗教之间互相视为异端，经常大打出手。既然一个政府认为自己代表了最接近于善的理念，那么是不是也该对各种异端邪说干戈相见呢？

小李：不一定。正如没有绝对的真理，在不同的条件下善的体现也不同。一种方式在一个国家内部是最接近于善的，不代表在别的国家也更接近于善。我觉得对外搞意识形态输出可能是有问题的，但是对内是要反对各种异端邪说的。

小明：既然善的适用范围有界限，那为什么这个界限就恰好是国境线呢？为什么不能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善呢？

小李：对于全世界来说，比现在这个局面更接近于善的方式还没有出现。如果哪天发现了这样一种方式，那么也应该去大力推行它的。之所以界限在于国境线，可以说是历史导致的。由于某种原因，历史上一个政权的管辖范围被确定了，国境内社会的演化过程和国境外很不一样，因此有了这一道鸿沟。

小明：我觉得什么是善这一类问题其实是无法讨论的。诸如“善是什么什么样的”这一类的句子，所有这一类的陈述，都不可避免地会将其中的某些语词的含义进行歪曲，如果仔细看这些句子，那么其实是完全不知道它们在说什么，讨论它们的对错也就更无从谈起了。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其实也是无稽之谈；他觉得世界上所有圆的背后必然有一个理想的圆，但是什么叫做“理想的”，他的解释也无非是在故弄玄虚地绕圈子罢了。我们并不是因为看到一个物体和什么理想的圆有相似性才称之为“圆”——这仅仅是我们，或者说我，对于“圆”这个词的用法恰好是这样而已。

小李：照这样说，岂不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讨论的了？

小明：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哲学的东西之所以不可以讨论，是因为这些命题中让一些语词脱离了生活形式。比如说“善”，我们平常说“这个人很善良”，因为我们看到他经常对别人施以援手，这就是我们对“善”这个词的用法；脱离了这个用法去使用这个词，那就无异于自己生造了一个新词，虽然“善”这个字大家都能听懂，但是这样的用法无异于咿咿呀呀的呓语。我们所能讨论的东西也有很多，比如说，“如果武汉不封城，感染人数会有多少”，这里面每个词都是清晰无误的，因此是可以讨论的。像“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好”这样的话，就是无法讨论的。像维特根斯坦说的，“可以说的，都可以说清楚；不可说的，都应保持沉默”。

小李：那像要不要封城这一类的决定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小明：我就不用“应该”这个词了吧。我们能讨论的，只是为什么现在的决策机制是这样，以及如果换成别的决策机制之后会怎样。至于好不好，就不是可说的范围了，当然人们自己会行动的。

小李：那么人们了解了所有这些可能的情景之后会做出决策，这背后是不是有规律呢？是不是就是可以称之为善呢？

小明：当然可以，只要你规定“善”的用法就是指这一长串的“如果那么”。不过这样的说法其实也就变成了同义反复。这一类的尝试是无益的，不如保持沉默罢了。